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八十八期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

编者的话：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包括“红岩儿女”。

“红岩儿女”是继“五四新青年”、“一二九青年”之后的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

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孽缘始于五四。五四知识青年，不仅创造了“五四精神”，而且也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五四新文化之口号为“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但在中共继承的五四精神中概念被逐渐转换了：科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民主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反帝反封建变为反西方反传统。五四的主题之一的“个性解放”被解释为为投身革命而挣脱传统的束缚等等。

作为知识分子道统的五四新文化与党文化之间的暧昧不清导致知识分子与中共之间的长期恩怨纠葛。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工作的重点从城市移向农村，党的性质与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它从知识分子的党变成了农民党，党的主体也从城里人转向了农民。但知识分子还是需要的。用五四精神召唤他们，再用党文化改造他们，而被改造的恰恰是五四精神。

当党制定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时，就表明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也表明了造反的农民对城里人的不信任。从“肃托”、“整风”到“反右”、“文革”，最初投身革命的娜拉们或者被波涛吞没，或者苦海余生，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尽管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诸多磨难，五四新文化的道统仍被坚持着，得以传承，《红岩儿女》一书就证明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宪政民主之风席卷全球，纵看中共道统是五四知识分子道统的偏支这一事实，恰好反映了共产思潮作为近现代主流思想偏支的历史。五四道统所蕴含的反对专制主义，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尽管还有种种缺陷，但仍不失为近现代主流思想的传承者。因此，在民主革命的大潮中，与其说知识分子的主流——民主派（无论党内党外）是党的同路人，不如说用新专制体制替代旧专制体制的力量才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如果说这一基本判断曾经在历史中被混淆和遮蔽，使许多知识分子迷失，那么，以后的历史将使这一判断再度被认知。

革命何以吞噬自己的儿女？

——绵绵难抑的思绪

戴 煌

感谢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垚同志编著的《红岩儿女》第三部《一生都在波涛中》。

抗战时候，重庆的红岩村，表面上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实际上是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它指导广大爱国青年男女，从事反抗高压专制统治和抗日爱国民主运动，所以这些青年男女被编者称为“红岩儿女”。其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二部《从激流到洪

流》都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早在 2006 年 6 月 14 日的《光明日报》第 10 版“书评”上经何如同志作了介绍，唯有这第三部《一生都在波涛中》，却未能出版发行。这是何道理？是否因为它历述了建国后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的兽性暴行，有人欲遮遮掩掩为尊者讳？如是，那是极其令人愤慨的！

现在，我在这第三部 82 万多字中，编摘了一些小小的零头，请头脑清醒的人看看究竟该不该公开出版？

（一）

首先，我介绍穆广仁同志记述的为争取法治而苦斗的赵树民同志。

赵树民，1923 年出生于河南北部的涉县（后划归河北），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南西部读中学，1944 年 21 岁，抱着以法律为武器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夙愿，投考已迁移至重庆的中央大学法律系司法组，一考而中。在学习过程中，他得到时在红岩中共南方局工作的法学专家张友渔的指引，运用法学知识，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统治进行合法斗争。那时他理想的新中国是实行民主与法治的。

1949 年 2 月，他受中央青委指派，以国统区南京学生代表之一，作为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之后，他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后随军南下，先后参加南京军械总厂的建团工作，任南京市第七区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南京第三工厂团委书记等。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他欢欣鼓舞，向公众大力宣传讲解，获得“优秀报告员”的光荣称号，并被任命为铁道部设在南京的铁路运输学校副校长。

仅仅过了两年，在 1957 年 7 月，“反右”斗争的风暴刮进了铁路运输学校。这个对党忠诚老实、曾被评为先进校长和优秀党员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右派”。这时，他在沪宁杭出差中听到了风声，匆忙赶回南京，参加南京市文教部的“反右斗争”。他千想万想也没想到，斗争的矛头就是指向他自己。说他努力工作就是为了“争工资、争先进”；说他出差就是为了“逃避反右斗争”；说他匆忙赶回南京就是为了“争夺反右领导权”；说他在教学中执行了“错误的阶级路线，依靠家庭出身不好、历史有问题的教师”；至关重要的一条“罪状”，是说他传达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厉行节约的精神时说过：“中央能领导一切，基层党不能领导。”而赵树民的原话是：“我们要把中央的精神吃透，结合我们的基层实际进行贯彻，否则就达不到厉行节约的目的。”

为此，赵树民就用宪法来保护自己。但这时的宪法，已被毛泽东当作一张废纸踩在脚下了。人们当然跟着“伟大领袖”走。赵树民依据宪法说理反击，反而被批判为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对共产党的“真理”进行狡辩，因而被升级为“极右分子”。这样，他立即被宣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牢记张友渔“合理合法”教诲的赵树民看来，这项宣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合乎事实。当天下午，他就去找南京市委书记彭冲。彭冲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说文教部长的宣布不算数，要赵树民把有关情况写个材料送给市委。赵树民回去后用了三天两夜，写了数万言自辩材料。

不料，这次是市委何副书记同他谈话。一上来，这位何副书记就不耐烦地说：“你写这么多材料，谁看呐！”赵树民说：“他们捕风捉影，造了那么多谣，我不得不写这么多弄清事实。”何副书记一听，反口说：“你是学法律的吧？你别拿国民党六法全书的观点来对待我们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如此一来，一向敬重赵校长的教师和学生深感意外并相对愕然。学生们张贴了几百张大字报，“为赵校长鸣不平”。这竟激怒了铁路运输学校的党总支书记，把其中三十多名学生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因为当时规定不在中专学生中划“右派”），又给赵树民新加了一

条罪名：“煽动学生闹事！”

1958年2月，在市委一位常委的安排下，一连开了三天会批判赵树民。虽然也让赵树民在会上申诉，但还没等他讲完就不让他讲了。拖到1958年年底，最后判决时的罪名包括“污蔑党对他的批评帮助是宗派陷害”、“态度极端恶劣”、“向党进攻极其嚣张狂妄”，等等。处分决定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第二天，他就被秘密送进一座监狱，随后又被送往一个炼焦厂进行“劳教”，与小偷、流氓、汉奸、历史反革命等混合在一起，每月只给八元生活费。1961年，他被送到江苏省“各界人士”政治学校学了三个月，然后作为保留公职的“摘帽右派”，遣回铁路运输学校，工资由原来的十三级降为十七级。

几年后，人性更加泯灭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了。1966年5月的一天，在铁路运输学校教书的赵树民突然被揪了出来，罪名是“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并立即关进了“牛棚”。在“牛棚”中关了三个月，残酷斗争一场接着一场，打得他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还被剃了阴阳头。赵树民不堪忍受这酷刑之苦，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翻墙逃出了学校，逃亡途中一头栽进深达数米的护城河，落下了脑震荡，整天头晕目眩。他不敢回家，而悄悄地上访北京“中央文革”。不料，上访接待站的答复是：“交南京文革委员会按政策办理。”结果他一回到南京，反添加了一条新罪状：“妄图逃避审查”，立即被一顿拳打脚踢打翻在地，又被踩上几只脚，踩得他胸骨骨折内陷。然后几个人将他高高抬起凌空摔下，摔得他左手腕外挠骨骨折，不省人事。这才把他弄回了家。

这顿恶打，对他这个“法律迷”不啻于当头棒喝。他在医院里治疗一个月，伤势远未好转，造反派就又要把他押回学校。他的十岁小女儿小明是个小机灵，乘造反派支付三轮车费的当儿，向爸爸使了个眼色，两人分头逃跑了。造反派一回来穷追小明，向另一个方向逃跑的赵树民却得以逃脱。他拖着仍上着石膏的手臂，跌跌撞撞地跑到一个铁路工人家，躲进厨房的草堆里，不敢再回家，甚至再不敢在南京停留，而浪迹合肥、上海、松江、苏州、天长、北京、邯郸……过了半年鼯鼠式的生活。这时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了，要“复课闹革命”，通知赵树民的妻子尤家玉把赵树民找回来。尤家玉还真以为是“复课闹革命”，于1969年9月18日，把躲在邯郸亲戚家的丈夫接回南京。赵树民也以为：“这下可好了，该讲点法律秩序了。”然而他回到南京的第二天，一进学校，就看到院墙上贴着这样的大字标语：“揪出隐藏19年的军统特务赵树民，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胜利！”这真是迎头一盆冰水。

但是“革命”的打手们也知道，从赵树民的口中挖不出他们所要求的口实，于是就从年仅十岁的小女孩小明身上做文章。他们竟说小明曾说过：“江青是姐己精下凡。”而年仅十岁的小明，连“姐己”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落了空，他们又对这个捏造的谎言加以演绎，说赵树民的三叔曾对孩子们说过：“毛主席是纣王宠姐己。”可是赵树民对此也是一无所闻。打手们就对他“文攻武斗”，并说他三叔是“兵痞子”、“赵家没一个好人”。这种种污蔑，使倔强的赵树民气愤到极点。心想，这些“革命者”有什么资格污蔑他的全家？他二叔过去是八路军的团政委，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他三叔原是八路军的侦察排长，后来去了东北，东北解放后又随四野一直打到海南岛；三叔的两个儿子，一个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一个后来是解放军中的师职干部。他父亲是位小学教师，送两个弟弟参加了八路军，真可算得满门忠烈。

听说这种历史背景，使得打手们也感到尴尬：他们谁能和这满门忠烈来比一比？转而他们又恼羞成怒，唯一的本事就是法西斯的拿手好戏——动刑。为首的就是铁路运输学校姓李的党委书记。他拣起一根木棒猛打赵树民，立即把赵树民打翻在地。这个李书记一边打一边还大声吆喝着：“我叫你硬！我叫你不低头！”就这样，赵树民的头顿时耷拉到胸前，左半身陷于瘫痪，左耳被打聋。这时，这个李书记却高声叫嚷道：“他耷拉着脑袋是假装的！”说完就喝令赵树民站在一条凳子上，用一根竹竿撑起他的下颚。这根竹竿撑不起一个脑袋的重量，就戳进下颚的皮肉之中，鲜血顺着竹竿向下流淌。赵树民实在支撑不住，从凳子上摔下

来。打手们再把他扶上条凳，再用竹竿撑起他的头颅，他又摔了下来。这个李书记就更加使劲地打，并且嘴里还大声嚷嚷：“打死这个老右派，我负责！”

这个李书记为什么这么凶狠？原来他是农村来的“三八式干部”，文化不高，赵树民这个知识分子原来是十三级干部，待遇比他还高，他实在找不到茬儿，出于狭隘忌妒心，就先把赵树民定为“右派”，现在又把他往死里打才解恨。这种人，在毛时代数也数不清。

1976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死了。不久，他的羽翼下的铁杆儿伙伴“四人帮”也被抓起来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就此了结。赵树民在“文革”期间的“反革命专案”和1957年的“右派”冤案先后都平反和“改正”了，他的爱妻尤家玉的“右派”冤案也获得了“改正”。赵树民决心不再浑浑沌沌地做个“优秀共产党员”，而要通过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来“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他筹建江苏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担任该所首任所长；1982年，他在全国法学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法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论文，首次打破了法的本质属性只限于“阶级性”的说法，扫除了过去法学可以任统治者随心截取的偏见。

1984年，57岁的赵树民主动申请离休，专攻宪法学研究。他不顾长期遭受迫害留下的持续性房颤的病体，潜心研究了古今中外有关宪法的理论与实践，历时十六个春秋，完成了一部六十万多字的专著——《比较宪法学新论》。

2005年1月8日，82岁的赵树民病重医治无效，带着“法治仍远，人治依旧”的遗憾走完了他为力争民主法治而拼搏不已的磨难重重的人生。

（二）

现在我再说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1939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陈璉同志的惨死。

据宋坤同志的记述，抗日战争开始，陈布雷举家西迁。到重庆后，为防日寇空袭，他把自己的家与不少官员的家都安在重庆以北的北碚，把陈璉安排在北碚国立二中女生部读书。二中的学生大多来自江浙一带的沦陷区，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陈璉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9年7月，她瞒着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了北碚地区的一大新闻，气得继母王允默不断地向陈布雷告状。

那时，陈布雷在国民党上层大名鼎鼎，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国策顾问”、侍从室二处主任，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1939年暑期，陈璉考取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之后，陈布雷鼓励她专攻技术，不要参加政治活动，说“政治太肮脏了”。陈璉针锋相对地反驳父亲说：“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抗日救亡急不可缓。政府只是口喊抗日，却老是‘转移’、‘迂回’，难道要躲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当喇嘛？你也不是没有看到，蒋介石的至亲孔祥熙他们大发国难财、荒淫无耻？我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但也绝不能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父亲只能无奈地叹口气说：“你们青年人要求进步，我不会阻挡。但是你也要设身处地地为我这个做父亲的想一想——我在政府任职，你若是竖起一面反政府的旗帜，别人会怎么说？我也是为了抗战、为了救国呀！”

有一天，陈璉佯装无意，把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遗落”在陈布雷卧室的案头。后来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父女在一起闲谈。陈布雷拿出那本书交给陈璉并叹了口气说：“璉儿，你前次忘了一本书在我房里。我多次说过，希望你体会阿爸的苦心，不要从事政治活动，静心读书。俗话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陈璉正要辩解，父亲说：“不要说了，家里不谈政治。”

1948年11月13日凌晨，极度抑郁的陈布雷对蒋介石彻底失望，服了大量巴比妥自尽。

陈琏，这个家庭的叛逆者，在西南联大从事进步民主活动。在发生皖南事变反共高潮的1941年初，因受到反动势力威胁离开学校到云南边远地区做秘密工作。1942年，经南方局安排，她从云南转至重庆，进入中央大学读书。抗战胜利后，她和恋人袁永熙（原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昆明一二一运动和后来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先后来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并在北平结婚。1947年9月，因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他们俩双双被捕，后经保释出狱。党组织决定把陈琏和袁永熙送到解放区，他们于1949年2月初，到石家庄与中央青委汇合，十几天后再次进入北平。

在充满欢腾和激动的1949年春天，袁永熙和陈琏都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袁永熙先在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后调到清华大学。陈琏先在少年儿童部当秘书主任，后被提升为副部长、部长，并当选为青年团第二届和第三届的中央委员和常委。

万万没有想到，风和日丽一下变为狂风暴雨。1957年，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换届后还是党委常委的袁永熙，突然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并被当作“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进行批斗，还上了《人民日报》。陈琏与袁永熙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相识，她深知袁永熙对共产党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的忠诚，他怎么可能站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边去呢？当组织上把清华大学党委对袁永熙的处分决定通知她的时候，她才明白袁永熙竟然真的被确定为“右派分子”。这个晴天霹雳把她打得懵懵的：“‘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就被打成敌人！我成了‘右派’的妻子，子女成了‘右派’的孩子！自己的家里出现了‘敌人’，我以后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怎么做少先队的工作？……”

与此同时，陈琏也遭受到从未经历过的“憎恨、嘲笑、蔑视、侮辱”。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连串的痛苦折磨着。在那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年代，政治高压笼罩着神州大地，陈琏在重庆中央大学时的同室好友陶琴薰，这时候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也突然被定为“右派”。国际部负责人认为她不该划为“右派”，但是上级领导人说：“陶希圣（注：抗战胜利后，陶希圣做过《中央日报》总主笔和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女儿，单凭这一点，也够了！”陈琏由此想到“那么我这陈布雷的女儿，又会怎么样呢？……”

这时候，一位陈琏本来尊敬的原先做青年工作的领导人、现时清华大学的领导人——袁永熙的顶头上司，正襟危坐地开导陈琏说：“袁永熙的堕落不是偶然的。他长期与党貌合神离，一旦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恶性发作，终于背叛革命，跌入反革命的深渊。……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是老党员了，一定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现在相当多的同志至今对党内右派还恨不起来，他们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其实斯大林早就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正是这样，党内右派最容易迷惑人，危害也就更大！”这位领导人还帮她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感情总是带有阶级性的。陈琏同志，你是坚强的。过去，你坚决与反动父亲决裂，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勇气，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现在革命深入了，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你应该比过去更成熟。我相信你不会长期被温情所困扰，党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陈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不语。

不久，儿子在幼儿园受到小朋友们的欺侮，说他是“大右派、大坏蛋的儿子”。儿子回到家问妈妈：“爸爸是右派吗？右派和地主、特务一样坏吗？”陈琏一下把孩子紧紧抱起，让他紧伏在自己的肩上，不让他看见妈妈的脸上滔滔不绝的泪水。但是孩子从妈妈胸部不停地颤动，知道妈妈在伤心流泪……

从此，陈琏与袁永熙不断地进行彻夜深谈。袁永熙提出，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除了离婚，别无选择。陈琏最后只得应声道：“为了我们的神圣事业，只好再做一次自我牺牲吧！”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华东局，急需一批干部，陈琏要求组织把她调去。在

一次会议上，她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说她要求调到上海去，便劝她说：“你还是留在北京好，中央更了解你。”这在重庆红岩就很熟悉的南方局的老领导对她的关爱使她很感动，但她不肯改变离京的决心。临行前，她请袁永熙的姐姐袁永懿的女儿——比陈琏只小八岁的孙士询帮助安排，让三个孩子去看看爸爸。这时候的袁永熙，已在昌平县长城脚下过了几年“苏武牧羊”式的劳改生活，孤身一人放牛喂猪，成了“摘帽右派”，并已得到通知即将到河北省南宫县继续“改造”，没想到临行前竟能看到五年没见面的三个孩子。他不停地亲他们，并抱着他们去逛公园，给他们买礼物，欢欢喜喜地玩了一天。孙士询带孩子们回到陈琏那里，当晚和陈琏与小弟弟挤躺在一张床上，陈琏一夜流泪到天明。分手时，陈琏对她说：“这些年，他也不容易……你告诉他，叫他多保重……孩子，我能管起来，他不用牵挂……”说着说着，忽然一把抱住袁永熙的这位外甥女，伏在她的肩头痛哭起来，宣泄了被久久压抑着的情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在华东局机关首先拿夏征农同志开刀。他几次到华东局宣传部煽风点火，亲自督战。多次揭批夏征农的大会，尽管很多人都气势汹汹，陈琏却总是作沉思状，躲在一个角落，一言不发。会前会后，她也不贴一张大字报。处里的同志问她对批斗夏征农有什么看法，她说：“我觉得夏征农这个人不错，很民主，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搞！”

的确，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她不能理解；对于发生在全国的一片混乱和灾难，她更感到不安。她想：这就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进行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期间，她有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原来非常熟悉的团中央所在地。没想到到这里也变了——大院里一片混乱，原先整洁的院墙糊满了大字报。她一向十分敬重的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等，脖子上都挂着黑牌子，被红卫兵抓着脊梁上的衣服，从窗户里提了出来，强按着头示众。她闭着双眼，不愿多看，并含着眼泪，带着更多的困惑和忧虑，扭头匆匆离开，也离开同样乱糟糟的北京。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往全国，各地立即刮起“抓叛徒”的狂风。4月，华东局就在“一月风暴”的余威下，把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1967年11月17日，华东局宣传部召开全体大会，勒令陈琏交待“历史问题”，大量污言秽语向她劈头盖脸地泼来。会后，她被押送回家。一到家，押送者就动手抄家，翻箱倒柜，从箱底翻出陈琏一直珍藏着的她和袁永熙的合影。“好大的胆子，她竟敢保存和右派老公的合影！”陈琏紧闭着嘴，沉默不语。押送者走后，陈琏放声痛哭，哭声极其凄惨。

第二天，她来到已待过六七年的办公室，就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和她说一句话，都远远地躲着她……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用“革命”的姿态来包装自己。这一天，陈琏在令人窒息的压力和孤独中度过。

19日是星期天，她起床以后，就忙于收拾房间，清点孩子们的衣物。午睡后，她洗澡换衣，还把脏衣服洗净晾好，像平常一样丝毫不麻烦保姆。家里静悄悄的，只有小儿子和保姆俩人在休息。她悄悄地问保姆：星期天了，大儿子怎么没有回来？这说明她很想和大儿子再见一面，而忘记了是她自己让大儿子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晚饭后，她问保姆还有多少布票，请她给女儿和小儿子添置衣服，又把两张银行存折交给保姆保管。保姆和小儿子睡后，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深夜，她从所住的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十一层楼破窗而下，一声巨响，惨死在地面上。

“浩劫”过去，冤案终于平反。胡耀邦同志为纪念陈琏写了八个大字：“家庭叛逆，女中豪杰”。这“家庭”当然是指她出生的原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那样的家庭。

(三)

现在为大家介绍文学翻译家潘痴云的奇特遭遇。

据潘痴云同志的遗孀李庆云讲述，1927年出生的潘痴云，出身于河北沧州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专科，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和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技工，编过《农报》。母亲是小学教师。抗战初期，父亲随高树勋部队抗日，后被汉奸邢仁甫杀害，当时潘痴云才10岁。

他自幼喜爱文学，也喜欢绘画。14岁，只身逃亡，辗转到大后方重庆。由于对也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徐悲鸿、傅抱石等大画师们的仰慕，连初中毕业文凭都没有的他，在16岁即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组，1946年夏，随学校迁回南京。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以犀利的笔作武器，写了许多战斗檄文，对专制统治进行斗争。为此被蒋介石专制政府列入黑名单，险些被捕。在这紧急关头，中共地下党吸收他入党，并安排他进入苏北解放区党校学习。南京解放后，他随大军渡江南下，被分配到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分校校刊编辑室工作。

校刊编辑室负责人阮某，在新四军做过随军记者，也曾是个共产党员。在蒋军大举进攻苏北解放区时，经组织批准，回到上海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组织生活中断。上海解放后，他找到从前的老上级，把他安排到华东军大南京分校校刊编辑室负责，但他的党籍尚未恢复。这样一个人却自以为“老革命”，常摆老资格，对自己仅担任这个科级单位的负责人深感不满，时时在青年中大讲怪话发牢骚。当时校刊只有潘痴云一个党员，阮的怪话牢骚给潘痴云开展党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加上阮某又根本不买潘痴云这个“毛头孩子”党员的账，事事找潘痴云的茬子。那时潘痴云才20出头，涉世不深，不知如何对待这种人，只一味地强调“团结”，并以当时校刊室里不团结的现象作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团结问题》，以“小俞”作笔名，发表在1950年9月13日《文汇报》的副刊“文学界”上。

阮某知道这篇小说是潘痴云写的，就自行“对号入座”，向组织处处长徐某汇报说：潘痴云无视组织领导，擅自在非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徐某立即召开批斗会，对潘痴云大加挞伐。罪名之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何要在非党报的《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罪名之二：作为共产党员，不经组织审查批准，就擅自在非党报上发表文章，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罪名之三：小说中的主角既像阮某又不像阮某，这是对阮某的诬蔑。

潘痴云当时血气方刚，对阮某、徐某所列的“三条罪状”压根儿不服。他从未听说过共产党员不能在合法出版的非党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发表文艺作品必须经组织上批准。因此和阮、徐二人发生争执。

这时候来了校一级的新领导唐某。此人只听阮、徐二人的一面之词，决定将潘痴云调出校刊室，以平息《团结问题》引发的风波。然而校方却把潘痴云挂了起来，一直不安排新工作。他感到十分委屈，就表示假如学校不要他，可以把他调出校外。这一来，可惹恼了唐某。他认为这冒犯了他的尊严，于是顺手拾起阮、徐二人给潘痴云定做的大帽子：“目无领导，不服从分配，无组织无纪律……”并扬言这是“政治问题”，给潘留党察看一年。

不久，潘痴云就被调到市委，要他住进市委招待所，并被告知等待另行分配工作。后来才知道，“组织”竟是他作为“精神病患者”“寄存”在那里的，因此在招待所期间，一直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话。他的“组织关系介绍信”自然就不知道应该转交到哪里。这一等就是一年多。

几经周折，才派他去昆山县（当时属于江苏省）人民政府工作。

到昆山以后，仍遭到白眼。尽管他被分配到城区政府部门，但具体工作仅是办理结婚离婚登记，每天从早到晚没有几个人来登记。他实在闲得无聊，就自学俄文。谁知，这却惹恼了昆山县文化不怎么高的领导干部，认为他“摆大学生架子，妄自尊大，工作时间还学外文”，

还是“无组织无纪律”、“目无领导”等等，帽子一大堆，在工作人员小组会上无情地扣在他的头上。

那时候新中国刚诞生，百废待兴，在遭到列强封锁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得到“老大哥”苏联的帮助，这就需要大量的俄语人才。潘痴云决心报考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后来改称上海外国语学院。1953年，他如愿以偿，进入俄专学习。

潘痴云的主课教师格列波娃很器重他，他用俄文写的诗和文章得到她很高的赞赏。她认为潘痴云的俄语水平，已相当于苏联十年制高年级学生的水平，却让他在一二年级学习最简单的变格变位，这太浪费人材了。但看到那个“破档案”的学校领导既不准跳级，也不准缺课。无奈，格列波娃只好私下里允许潘痴云在上课的时间阅读他喜爱的俄文文学作品，而潘痴云竟然边阅读边翻译起来。

这时候开了一门“俄语实践”课，由一个也是20来岁的苏联姑娘任教。对潘痴云来说，这课对他也没有多大意思，就仍坐在最后一排专心致志地伺弄他的“自留地”——翻译俄文书稿。这位年轻女教师不知道他的俄文实际水平，几次要他回答问题，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自然也就没有回答，或者虽然也应声站了起来，却不知道应该回答什么问题。校方知道这个情况后，依然按照那个“破档案”中的老套套，给他照旧戴上“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帽子，并指使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召开批判会批判他。过后不久，校方就勒令他“自动退学”。

1955年，潘痴云“自动退学”，到了在西安教书的母亲处。自从1941年他14岁只身逃难后，14年里未见过母亲，母亲竟认不出已长大成人的儿子，问他“找谁”，这使潘痴云哀伤地痛哭起来。所幸不久，北京人民出版社约他翻译《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这部书的译稿1957年出版后，颇受读者喜爱。之后人民出版社又约他翻译亚美尼亚作家卓利扬的长篇《一个人的生活》、苏联伊万诺夫的《游击队员》等等。从此约稿不断，但因远住西安，常常由于通讯不及时而延误了交稿时间，于是母亲主动辞职，和他一起住到了上海。

谁知国内国际政治风云变化无常。1961年，当时全国唯一发表译文的杂志《世界文学》突然停刊，潘痴云失去了发表译作的阵地。能够出版外国文学翻译书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也不向他约稿了。随着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作品的介绍也突然被停止，并且又听说“爱伦堡不行了”，“肖洛霍夫有问题了”，今天这个作家的作品不能介绍，明天那个作家又被打上“修”字，中国报刊杂志并且集中火力围剿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批判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性论”，甚至把这项大帽子戴到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头上，批判其世界名著《悲惨世界》。

这样，文艺翻译界一时无所适从，介绍资本主义世界的作品怕“副作用”，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又怕作者被扣上与苏联“修正主义”有关系的大帽子。某个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只好约他翻译东欧和亚非拉作家的作品。他遂翻译了波兰的《灰色的光轮》、罗马尼亚的《一封失落的信》和《罗马尼亚短篇小说和戏剧选》、巴西的《金钱的故事》及《墨西哥短篇小说选》，还有《伊朗当代短篇小说选》。但最终都是徒劳。虽然这些译稿出版社都准备采纳，但后来都小心翼翼地婉言退了稿。因为按照当时中国特殊的意识标准，在这些作品中难道不会找出一些“对社会主义不利”之处？于是这逼得潘痴云干脆翻译一些超时代的童话、民间故事和寓言，但又被认为“太人性化”和有“借古讽今”之嫌，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就完全沉默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一张大字报出现在潘痴云家的宿舍大门口，大意是：商业二村2号205室潘痴云，长期隐瞒身份，以翻译外国小说为名大肆放毒。严重警告潘痴云：必须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否则无产阶级的铁拳是无情的，到时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署名“革命群众黄爱武等”。

这张大字报，是这一大片工人住宅区的第一张大字报，引来了成百上千人观看。当天下午，附近五十二中学的一些学生突然闯进205室，将潘痴云揪出批斗。“要武”的“革命小

将”们踢打他，也把他生拉硬拽到屋外空地上，让他站在事先已摆好的小凳子上，“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这个一向耿直认真的人不低头、不言语，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行。于是又招来一阵殴打，并有人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交出你平日大包小包拎回家的情报！”这显然是平时盯着潘痴云夫妇日常包裹外文书刊的手提袋了，所以潘痴云拒不承认。当天晚上，五十二中的一些学生在幕后人的指使下破窗而入，抄了潘痴云夫妇家 15 平方米的一个房间。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第二天一早，潘痴云的妻子李庆云就到五十二中找到带头抄家的红卫兵。这位小将说，是派出所的“警察叔叔”叫他们去抄“反革命特务的家”的，是“警察叔叔”指使他们撕毁棉絮和枕芯，打碎画框、热水瓶，翻查每一本书，为的是寻找“反动证件”，结果抄不出任何“反动证件”，使他们很失望。最后只抄出四本文集，交给在对面厨房里指挥他们抄家的“警察叔叔”了。

由于小将头头单纯，说出了“警察叔叔”四个字，这才使潘痴云夫妇知道：后台是公安部门。交给“警察叔叔”的四本文集，是解放前潘痴云在蒋管区大学时代从事民主运动时所写的反对国民党专制当局的战斗檄文，分别题名为《毁灭》、《蓓蕾》、《桥头堡》和《遵命集》。四本文集经公安部门像破译密电码似地仔细研究了个够，发觉这原是针对国民党反动专制的，他们感到很被动，又不敢把它们销毁，深感自找大麻烦。李庆云给派出所和公安局贴了张大字报，警告他们：谁毁了这四本文集，谁就是站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去了！潘痴云在上访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上访接谈人李彬立即电告上海政治指挥部：必须将这四本文集妥为保存，因为这些文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见证。

在“文革”中，潘痴云、李庆云夫妇 15 平方米的这间小屋，先后被抄了三次。第一次，主要是找“反动证件”；第二次，抄走全部信件去“破译密电码”，找“苏修特务”的证据；第三次，抄走所有的照片，想找出他们夫妇与“反动物物”关系的蛛丝马迹。这都是奉公安部门之命而来的。从四本文集真相冲破公安部门的“怀疑”网起，迫于压力，1967 年下半年，由政治指挥部通知公安局，到潘痴云家赔礼道歉，声称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归还了四本文集和信件。

其实，在“文革”前多少年，潘痴云就早已被列入“另册”了。在一切不实之词应该完全推倒后，公安机关又以“脱党分子”、“因有严重政治问题被上海外语学院开除”等等不实之词来管制潘痴云。总之，潘痴云一生的不幸，就始于写了一篇《团结问题》的小文而迭遭横祸，以致失去了党籍，失去了固定工作；没有了固定工作，则又长期成为“敌人”。在那捧上一个“铁饭碗”才被认为“正常人”的年代，被怀疑具有“不正常”身份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而“无业游民”招来的嘲笑和鄙视，都是无法申诉和辩解的。受害人只能任由别人随时随地贬损自己的人格、折磨自己的灵魂。但是尽管如此哀伤，潘痴云还是在文学翻译中取得了可观的业绩，翻译出版了许多部文学名著，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他要求恢复党籍一事不但是徒劳，而且一次又一次感到揪心的疼痛。加以 1991 年到 1992 年，出版社约定的四部书《罪与罚》、《贵族之家》、《卡扎科夫散文选》和《摆脱克格勒》的译稿交稿的时间都很紧，他把痛苦藏在内心深处，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忘我劳作，出色地完成交稿任务后，终因多年积忧积劳，身罹不治之症——肺癌，于 1994 年 8 月 20 日，离别了对他不公的人世，年仅 67 岁。

潘痴云生前常说，只要他的译书和译文能够得到读者的喜爱，就心满意足了。他逝世后，李庆云收到全国各地老同学和老朋友、以及多家出版社寄来的慰问信，信中对他的不幸早逝表示沉痛哀悼，对他的为人、译稿及译风给予高度评价，对他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极大的赞扬，并为失去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而痛惜。老同学们为他的一生的不幸鸣不平的同时，更为他一生处于逆境能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富有的大写的“人”而十分敬佩。昔日的

战友中，还有人称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卓然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他的永生的灵魂，属于在苦难中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

（四）

第四位我要谈的“红岩儿女”，是吃了很多苦，还能矢志不移写出举世无双的巨著的周邦立同志。

据许良英、黄宗甄同志的记述，周邦立出身贫苦，少年时刻苦自学。抗战初期，他考入了当时由竺可桢教授担任校长的浙江大学，后转入贵州遵义。甫进校门，他便参加了进步团体“黑白文艺社”，经受了抗日战争中艰苦生活的锻炼和浙大民主精神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一边刻苦学习专业，一边积极地投入救亡运动。“黑白文艺社”以文艺为名，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政治热情的青年学生的爱国团体。周邦立负责管理这个团体的图书。在遵义何家巷学生宿舍一个偏僻角落，有两间常年不见阳光的小屋，他就住在那里，那里也就成了“黑白文艺社”的图书馆。这个小小图书馆引导许多同学抉择了他们一生要走的道路。他的英文、德文程度原来就较高，入浙大后又努力学习俄文，并通晓了这三种外文。

1942年，在贵阳，周邦立经原高中同学胡庆曾介绍入了共产党。1946年前后，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科学时代”，并出版了同名刊物《科学时代》，宗旨是宣传民主、普及科学、团结进步的科学家，很快在全国就有了一定影响。周邦立到上海后参加了这个组织，并为《科学时代》撰写和翻译了不少文章。

全国解放后，周邦立先后在中华书局、华东建筑工业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工作过。建国初期，他也欢欣鼓舞，在所在单位工作是很积极的，但过了一段时间，渐渐流露出消极情绪，因为对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感到不解和厌倦。他认为，过去国难当头，蒋政权专制腐败，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哪能埋头读书做学问呢？现在国家处于和平建设时期，急需科学、需要知识、需要潜心做学问的人，而这都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相反，倒是倾向于权力、热衷于政治向上爬的人太多，靠那么多的科盲、文盲怎能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这每天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太多啦！坐在办公室里开会、清谈、斗争、批判，就能建设社会主义？许多原来搞业务的人都去搞政治了，他想反其道而行之。他坚信，孰是孰非，几十年后再看吧！

这个惜时如金的人，渴望着为社会为人民多做点好事。经过反复考虑，他终于下定决心，申请辞退，做个“单干”的职业翻译工作者。

开始，他翻译苏联米丘林学派的著作，后来转而翻译和评价达尔文的学说，成为我国达尔文著作的主要译者之一。1959年是达尔文诞生150周年和《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周邦立根据自己多年翻译和研究的成果，撰写了一篇《达尔文年谱及其著作》。可发表后，他却对自己很不满意。因为他很推崇达尔文，认为达尔文一生都在为真理和正义献身、为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生活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值得大书特书，而自己那篇短文却介绍得过于简略了。想到古今中外研究达尔文的学者虽不少，可是以年谱的形式记述他的伟大一生的却还没有，于是周邦立决心为达尔文写一部内容翔实丰富的年谱。

三十多年中，为了翻译达尔文的各种著作和编著《年谱》，他广搜博集有关达尔文的各种资料，所有达尔文的英文原著，以及这些著作的俄文版和中文版，他几乎全部阅读过。达尔文的日记、书信及各国专家学者对达尔文的研究和评论，他都反复批阅予以摘录，并编制了大量卡片。他还参阅了《资本论》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的有关著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

在编写《年谱》的过程中，每遇疑难，他都不惮烦难地写信，向英国研究达尔文的专家

弗里曼教授请教和核实。

作为“社会闲散人员”，周邦立无法领到图书馆的借书证。他只好拜托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朋友辗转代借。文革结束不久，华东师范大学聘请他做特约编审，每周到校一次，给科技情报人员讲解翻译技巧并解答问题，这样他可以领一张借书证，到图书馆借书。但是毕竟是临时工，只做了一年，借书证就被吊销了。

不仅如此，在上海，他一家五口都挤在不到 20 平方米的两间亭子间里面，屋子里到处堆满书籍，连在桌子上摊开一张稿纸也要煞费苦心地巧妙布局。子女们晚上要做功课，他只好把桌子让给孩子，自己在双腿上架一块木板，或者把棉被折叠起来当作小桌子来写作，直到夜深人静，儿女们都睡觉了，他才能坐到桌子前继续挥毫译著。三十多年中，他大体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的。尽管条件如此简陋，他工作起来仍然效率高、出活多。在生活上，周邦立自律甚严，虽然稿费收入稍多些，却总是粗茶淡饭，衣履甚至简朴到有些破烂的程度。但是对于有了坎坷遭遇的朋友，他却从不吝啬，总是慷慨解囊，济人急难。

就这样，他这个“单干户”，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苦干三十来年，译著约 1500 多万字，已出版的共计 69 种（含与人合译 20 种）。此外，还有一些尚未出版的译稿，以及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260 篇以上。

其中，他撰写了世界上最完备、最准确的《达尔文年谱》。1982 年 3 月，为纪念达尔文逝世 100 周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专著。全书 40 万字，附有许多珍贵照片、航行地图和 50 余幅插图。内容包括达尔文的家族和家庭环境、童年生活、求学经历、环球旅行和科学实验的始末、研究和著述过程、家庭生活、朋友往还、晚年与疾病顽强斗争的动人事迹，以及身后的哀荣。

由于编著者周邦立的辛勤搜集，这部年谱还公布了不少国内过去从未发表过或语焉不详的宝贵资料。它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大科学家谦光恢宏的风格气度和严谨的治学作风。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与达尔文这两位科学巨人之间的一段交往。那是 1873 年，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出版后，马克思曾把它寄赠给达尔文，并在该书的扉页上亲笔写了“查理士达尔文惠存，诚恳的敬仰者卡尔马克思 1873 年 6 月 16 日”。达尔文为此特向马克思复信致谢。《年谱》刊载了这一复信原稿的照片。

也由于这是一部内容翔实、文笔生动感人的年谱，而且是在国内外从未出版过同类著作的情况下，由我国首先出版的，因此它一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国内外读者反响强烈。初版 6000 册，数日内即告售罄，不得不立即重印。时年 98 岁高龄、住在英国伦敦北白金汉郡的达尔文的孙女爱玛诺娃曾编过许多有关达尔文的书籍，如《达尔文旅行日记》、《达尔文和贝格尔舰的旅行》、《达尔文回忆录》等，当她拿到这部年谱的时候，激动不已，欣喜异常，特意寄语编者和中国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达尔文参考手册》的编著者——英国伦敦大学动物学教授弗里曼，获悉《年谱》出版后，多次给周邦立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件，表示赞扬和激赏，并把这部书送到伦敦英国博物馆及其他学术机关和图书馆陈列和珍藏，其中特别赠送给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并亲自为美国著名的《自然》杂志撰文，介绍这部著作。

1982 年 4 月，北京召开了纪念达尔文逝世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周邦立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于周邦立来说，这次来京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自从辞职“单干”后，他已多年没有到过北京。这次，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老同学。他兴奋地告诉老友们说，听了代表们的发言，很受启发和鼓舞，觉得他这个“学术个体户”更有用武之地，回去后要抓紧迟暮之年，争取把《达尔文自传》、《达尔文论文汇编》都尽早翻译出来。看着他劲头十足的样子，大家都为他高兴，他才 64 岁，在学术上正是丰收季节。

但是，南归沪上不久，周邦立就被确诊为肝右翼癌症。直到逝世前一个星期，靠了好心的邻居们的帮助和疏通关系，他才得以住进医院的急诊室。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确诊后不过一个月，他就溘然长逝。由于没有所属单位，他身后是凄凉的。

观察周邦立的一生，令人感慨：如果国家当时真正善待知识分子，真正尊重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给周邦立这类的学者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他们就可能甚至必然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上例举，在建国后，许多“红岩儿女”都遭受了残酷无情的迫害。

现在，如何对待上述的这段历史？

我们对日本人口口声声“以史为鉴”，总不能对自己的史实遮遮盖盖、隐隐讳讳吧？

脱稿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周年于北京